【区域协调发展】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测度与提升路径*

方大春 裴梦迪

摘要:把握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及特征,能够充分发挥安徽融入主动性,有利于实现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基于“高质量一体化”和“融入”内涵,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结果显示,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一体化具有良好基础,协同一体化程度较高但仍需提升,市场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经济一体化变化平缓,创新一体化水平落后。针对上海“龙头效应”不足、安徽“洼地效应”不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以及发展战略差异化不足等制约因素,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要以产业共生夯实深度融合根基,以城市功能互补构筑深度融合载体,以创新驱动增强深度融合动力,以要素配置空间耦合提高深度融合效率,以协同治理落实深度融合责任。

关键词:安徽;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测度;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0)03-0035-09 **收稿日期:**2020-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研究”(19YJA790010);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研究”(AHSKZD2018D06);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安徽省新旧动能转换路径研究”(SK2019ZD06)。

作者简介:方大春,男,安徽工业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马鞍山 243032)。

裴梦迪,女,安徽工业大学硕士生(马鞍山 243032)。

一、引言

长江三角洲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需要将腹地深入内陆以更好辐射中西部地区,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一极三区一高地”,即建设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这是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的共同奋斗目标。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加入长

江三角洲是推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使命要求,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范从来,2019)。安徽加入长江三角洲能够直接承接长江三角洲产业外溢,为长江三角洲资源配置提供更大选择空间。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需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关于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研究多为理论分析。范从来(2019)、孟天琦(2019)、姚玫玫(2016)等学者分别从基础、差距、优势和问题等方面探讨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使命与作为、制约因素和实现路径,但对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缺乏定量研究。定量

测度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关键在于指标选取,目前研究中关于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评价指标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从单个指标或某一维度评价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如市场一体化(杨风华等,2012)、经济一体化(陈坤等,2013)、空间一体化(陈雯等,2013)、公共服务一体化(武义青等,2017)等。二是选取多指标构建多维度评价体系测度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李世奇等(2017)从分工、竞争、协作三大核心要素出发,构建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指标体系,包括市场统一性、要素同质性、发展协同性和制度一致性4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顾海兵等(2017)从市场、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政策体制5个维度选取13个评价指标。曾刚等(2018)构建包含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保护4个方面的20个核心指标。纵观现有评价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指标体系,有些仅考虑单方面一体化,难以全方位评价一体化水平;或者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但未对分项指标进行深入设计,缺乏高质量背景下一体化的新内涵体现。

鉴于此,需要在准确把握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融入”和“高质量一体化”内涵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并探寻内在原因,给出提升策略。

二、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指标选取与处理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不仅是单方面“加入”,也是相互“协同”,测度指标不仅要有反映加入长江三角洲的“差距”指标,而且要有“协同”指标。对于“差距”指标和“协同”指标,需要采取不同处理方法。

1. 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指标选取

高质量一体化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等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合作开放和竞争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使区域内各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实现高质量发展(陈耀,2019;刘志彪,2019;陈建军,2019)。本质上,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就是要保证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市场一体化是前提,经济一体化是基础,空间一体化是载体,创新一体化是支撑,社会一体化是保障,协同一体化是状态。充分考虑指标代表性、可操作性、综合性

及科学性,从6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见表1。

2. 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指标处理

指标分为差距类指标和协同类指标。差距类指标包括市场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和创新一体化,主要考察安徽融入能力。通过计算各项指标下“安徽值/沪苏浙均值”大小考察安徽与长江三角洲其他两省一市的差距,判断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能力基础,比值越大,说明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的基础条件越好、融入能力越强。不同于差距类指标,协同类指标主要考察安徽融入效果,通过计算各项指标下“加入安徽值/不加安徽值”,考察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整体协同效果;比值越大,说明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越容易推进。正向指标值越高表明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越高,逆向指标值越高表明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越低。具体正向或逆向指标见表1。

由于指标属性并不一致,测算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时,需对指标做同向化处理。对于逆向指标,采用“倒数逆变换法”取其倒数。基于融入指标含义特殊性以及各维度指标的重要性,采取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大小,经过多轮征询和意见反馈,最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相等。研究年份为2010—2018年,原始数据来自2011—2019年的各省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年份统计公报。部分指标缺失2018年数据,则根据前三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得来。

三、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测度与分析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测度包含二级指标体系,需要先总体把握一体化水平发展趋势,再从市场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空间一体化、社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和协同一体化等维度,进一步考察影响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因素。

1.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总体水平测度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总水平及各维度水平(见表2)。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总水平稳

表1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指标类型
市场一体化	工资水平比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工资	正向	差距
	利用外资比	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额占GDP比	正向	差距
	金融市场比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	正向	差距
	PPI指数比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逆向	差距
	CPI指数比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逆向	差距
经济一体化	人均产出比	人均GDP	正向	差距
	可支配收入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差距
	经济结构比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正向	差距
	恩格尔系数比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逆向	差距
	失业率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	逆向	差距
空间一体化	城镇化率比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	正向	差距
	城市建设比	城市建成区占区域城区面积比	正向	差距
	公路网比	每百平方公里内的公路里程数	正向	差距
	铁路网比	每百平方公里内的铁路里程数	正向	差距
	信息网比	每万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正向	差距
社会一体化	教育水平比	人均受教育年限	正向	差距
	空气质量比	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气比	正向	差距
	医疗条件比	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	正向	差距
	社会治安比	犯罪率	逆向	差距
	生命健康比	死亡率	逆向	差距
创新一体化	创新成果比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	正向	差距
	技术转化比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	正向	差距
	能源消耗比	单位GDP能源消耗	逆向	差距
	技术效率比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正向	差距
	创新产出比	高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	正向	差距
协同一体化	产业同构比	产业结构相似性系数	逆向	状态
	专业化程度比	克鲁格曼专业化系数	正向	状态
	区域增长收敛比	人均GDP增长率方差	逆向	状态
	人口首位度比	城市人口首位度	逆向	状态
	经济联系强度比	绝对经济联系强度	正向	状态

注:为便于统一分析,在后面分析中将逆向指标取倒数,转换为正向指标,指标值越大越优。

表2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

指标 年份	一体化 总水平	市场 一体化	经济 一体化	空间 一体化	社会 一体化	创新 一体化	协同 一体化
2010	0.7550	0.7881	0.7434	0.7402	1.0257	0.3423	0.8903
2011	0.7597	0.8071	0.7291	0.7441	1.0087	0.3792	0.8897
2012	0.7843	0.8342	0.7301	0.7819	1.0691	0.4031	0.8872
2013	0.8130	0.8587	0.7439	0.7968	1.1360	0.4616	0.8808
2014	0.8284	0.8927	0.7757	0.7913	1.1201	0.5100	0.8807
2015	0.8364	0.9308	0.7576	0.8422	1.0801	0.5389	0.8691
2016	0.8391	0.9513	0.7568	0.8648	1.0363	0.5567	0.8689
2017	0.8374	0.9744	0.7703	0.8811	0.9738	0.5611	0.8635
2018	0.8416	0.9843	0.7704	0.8896	0.9832	0.5682	0.8538
均值	0.8105	0.8913	0.7531	0.8147	1.0481	0.4801	0.8760

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值超过0.8且有望突破1;经济一体化水平低于0.8且变化平缓;空间一体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且均值超过0.8;社会一体化水平最高且均值超过1,部分指标优于沪苏浙均值;创新一体化水平明显落后,与其他几项水平差距较大且近几年增长速度放缓;协同一体化水平大于0.8,但有所下降,仍需提升。

2.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维度分析

为便于统一分析,将下文PPI指数比、CPI指数比、恩格尔系数比、失业率比、社会治安比、生命健康比、能源消耗比、产业同构比、区域增长收敛比、人口首位度比等逆向指标,全部变换为“沪苏浙均值/安徽值”或“不加安徽值/加入安徽值”,比值越大,一体化进程越容易推进。

第一,市场一体化维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实际上是在区域内建立统一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证各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就必须有发育良好的市场体系和统一市场做基础,因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首要是实现市场一体化,包括劳动力市场、利用外资、价格水平、金融市场等。选取基础指标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工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其中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为负向指标,价格指数越小,越容易吸引资源要素进入该区域。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3。

安徽利用外资水平呈稳步增长,实际利用外资

表3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市场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工资水平比	0.6826	0.7102	0.7454	0.7008	0.6856	0.6834	0.6695	0.6767	0.7107
利用外资比	0.7025	0.7775	0.8407	0.9804	1.1119	1.2576	1.3483	1.4786	1.4944
CPI指数比	1.0045	0.9972	1.0023	0.9990	1.0072	1.0053	1.0065	1.0063	1.0007
PPI指数比	0.9657	0.9668	0.9929	0.9993	1.0130	1.0217	0.9990	0.9664	0.9964
金融市场比	0.5853	0.5841	0.5900	0.6141	0.6456	0.6860	0.7330	0.7438	0.7191

占GDP比近几年超过沪苏浙均值;金融市场比值小幅提升但仍小于1;劳动力工资水平比值小于1;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接近1,但总体来说,安徽生产者价格指数相对沪苏浙略高,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对沪苏浙略低。安徽与沪苏浙在投资环境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差距缩小,劳动力市场相对低廉,价格水平缺乏吸引要素集聚优势。

第二,经济一体化维度分析。经济一体化是实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物质条件,包括产出、

收入、经济结构、消费和就业等。基础指标选取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其中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W=q(1)+2q(2)+3q(3)$ 。该式实际上是对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加权求和,按三次产业的层次高低依次赋权。式中W越大,该区域结构层次系数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4。

表4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人均产出比	0.3495	0.3787	0.3986	0.4083	0.4083	0.3989	0.3969	0.3985	0.4093
可支配收入比	0.5766	0.5967	0.6041	0.6021	0.6030	0.6037	0.6029	0.6028	0.6041
经济结构比	0.9033	0.8983	0.8952	0.8953	0.8967	0.9048	0.9088	0.9164	0.9239
恩格尔系数比	0.9146	0.8892	0.9238	0.8336	0.9187	0.8163	0.8334	0.8307	0.8314
失业率比	0.9730	0.8829	0.8288	0.9804	1.0521	1.0645	1.0417	1.1034	1.0833

人均产出比、可支配收入比、经济结构比以及恩格尔系数比值都小于1,安徽相比沪苏浙在经济方面基础较差。但安徽就业形势向好,近年来失业率低于沪苏浙均值,一方面是由于沪苏浙的失

业率统计数据中存在摩擦性失业;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使得沪苏浙失业率较安徽值高。

第三,空间一体化维度分析。空间一体化承载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反映在人口布局紧凑型、城市化建设区域大小、交通往来便利性、信息技术传递速度等方面。选取基础指标为城市化水平、城市建成区占区域城区面积、每万人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其中公路网密度和铁路网密度分别为每百千米内的公路里程数和铁路里程数。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空间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5。

表5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空间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城市化比	0.6101	0.6296	0.6472	0.6595	0.6713	0.6889	0.7006	0.7149	0.7240
城建区域比	1.4161	1.3597	1.4325	1.4188	1.4129	1.4372	1.4582	1.4582	1.3938
公路网比	0.7393	0.7315	0.7888	0.8206	0.8108	0.8567	0.9034	0.9244	0.9548
铁路网比	0.6036	0.6009	0.6233	0.6448	0.6286	0.7178	0.7331	0.7332	0.7171
信息网比	0.3319	0.3989	0.4176	0.4402	0.4328	0.5103	0.5286	0.5749	0.6584

第四,社会一体化维度分析。社会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保障,反映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教育水平、生态环境、医疗条件、社会治安、生命健康方面的均等化程度。选取指标为人均受教育年限、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气比、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犯罪率、死亡率。其中人均受教育程度用全部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

公路网密度、铁路网密度以及信息网密度比值均上升但仍然小于1,其中信息网相对落后。城市化比值小于1,但城市建设区域比总体上升且始终大于1,安徽城市建设区域大于沪苏浙,但安徽城市化水平却远低于沪苏浙,其土地规划、土地供应增加的速度远超城区人口增长速度。这反映出安徽城市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导致中心城区偏弱、产业发展不发达、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跟不上本地人口改善生活水平的迫切需求,可能造成大量人口外流。

设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以各受教育水平在人口中的比例为权重,得到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犯罪率采用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情况与常住人口数的比重代替。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社会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6。

各指数值均大于0.6,社会一体化差距总体较

表6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社会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教育水平比	0.8492	0.8693	0.8772	0.8713	0.8960	0.9166	0.8660	0.8566	0.8909
空气质量比	1.0498	1.0511	1.0321	1.3341	1.2137	1.0834	0.9746	0.8854	0.9087
医疗条件比	0.6955	0.7446	0.7661	0.7679	0.7837	0.7777	0.7721	0.7823	0.8062
社会治安比	1.5540	1.3924	1.7002	1.7333	1.7029	1.6349	1.5872	1.3339	1.3031
生命健康比	0.9798	0.9859	0.9701	0.9736	1.0040	0.9877	0.9815	1.0107	1.0073

小。社会治安比超过1.2,近年来人口流动成为普遍现象,外来人员的犯罪行为可能给本区社会稳定和治安形势带来不安定因素,安徽相比沪苏浙地区外来人口流入量较小,社会治安相对更稳定。安徽生态环境基础较好,但发展过程中产业承接与环境保护未能很好协调,总体上表现波动下降。空间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加快安徽内人口流动和产业承接规模,2013年以后空气质量比和社会治安比数值均有下降。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比均小于1,但近年有小幅提升。生命健康比维持稳定且与沪苏浙差距甚微。

第五,创新一体化维度分析。创新一体化是长江三角洲区域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支撑,主要体现在创新成果、技术比、能源消耗比、技术效率、创新产出等方面。选取指标为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单位GDP能耗、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GDP比。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为年总产值与年从业人员之比。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创新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7。

各项指标数值均小于1,安徽总体创新能力相对于沪苏浙较弱。创新成果比、技术转化比和创新

表7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创新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创新成果比	0.1103	0.1461	0.1717	0.2468	0.2639	0.3408	0.4074	0.3173	0.3576
技术转化比	0.3361	0.3744	0.4234	0.5773	0.6854	0.7041	0.6658	0.6630	0.5472
能源消耗比	0.7992	0.8205	0.8174	0.8234	0.8088	0.7981	0.7985	0.8000	0.7973
技术效率比	0.2854	0.3052	0.3160	0.3219	0.3475	0.3403	0.3393	0.3428	0.3545
创新产出比	0.1804	0.2498	0.2869	0.3385	0.4445	0.5111	0.5726	0.6822	0.7846

产出比上升较快,但比值仍低于1。能源消耗比值接近0.8,安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高,间接反映其技术装备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较弱于沪苏浙。技术效率比值小幅上升但仍低于0.4,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虽然近几年安徽发展速度很快,但其他城市同样在发展,特别在创新水平方面安徽与沪苏浙相比差距悬殊。2018年安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约为沪苏浙均值的35.45%,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为沪苏浙均值的35.76%,加速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还需缩小区域内部创新发展水平。

第六,协同一体化维度分析。协同一体化体现长江三角洲三省一市的协同纽带关系,必须是在联系中发展,发展中关联。衡量协同一体化不能单看某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将三省一市放在统一框架下,考察省市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和整体联动效应。选取指标为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人均GDP增长率方差、城市人口首位度(计算与1差距的绝对值,差距越小越好)、经济联系强度。

其中,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反映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度,计算如公式(1), X_{ik} 和 X_{jk} 分别是区

域*i*和区域*j*的第*k*个产业在整个区域的所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 $0 \leq S_{ij} \leq 1$,其值越大,表明两个区域之间的结构相似程度越高,值取1表示两地区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城市人口首位度反映城市群城市体系的发展特征,计算采用11城市法如公式(2), P_i 表示第*i*个城市的居民人口总数。经济联系强度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程度大小,计算如公式(3), R_{ij} 为两省的绝对经济联系强度, P_i 、 P_j 分别是地区*i*、*j*某一年的城市人口数; G_i 、 G_j 分别是地区*i*、*j*在某一年的GDP, D_{ij} 表示第*i*个地区和第*j*个地区之间的距离。

$$S_{ij} = \frac{\sum_{k=1}^n X_{ik} X_{jk}}{\sqrt{\sum_{k=1}^n X_{ik}^2 \sum_{k=1}^n X_{jk}^2}} \quad (1)$$

$$S_{11} = P_1 + P_2 + P_3 + P_4 + \dots + P_{11} \quad (2)$$

$$R_{ij} = \frac{\sqrt{P_i G_i} \cdot \sqrt{P_j G_j}}{D_{ij}^2} \quad (3)$$

经测算,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创新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见表8。

表8 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协同一体化水平各指标值

年份 指标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产业同构比	1.0078	1.0125	1.0149	1.0167	1.0154	1.0090	1.0068	1.0058	1.0031
专业化程度比	1.0686	1.1292	1.1455	1.1317	1.1230	1.0702	1.0447	1.0123	0.9597
区域增长收敛比	0.3159	0.2471	0.2031	0.1781	0.1861	0.1883	0.2157	0.2176	0.2162
人口首位度比	0.9729	0.9550	0.9533	0.9511	0.9477	0.9470	0.9458	0.9454	0.9446
经济联系强度比	1.0862	1.1047	1.1190	1.1266	1.1317	1.1311	1.1315	1.1362	1.1454

产业同构比大于1,且近年来比值下降,说明安徽的加入在初期可以拉低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同构性,但在融入长江三角洲过程中,安徽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产业同构性也在逐渐增强。专业化程度比大于1,安徽加入长江三角洲提高产业专业化分工,但2013年后专业化程度比值下降

(2018年比值小于1)。一方面,空间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改善企业投资条件,使得企业可选择在安徽境内投资,产业布局趋于多元化,区域专业化程度减弱;另一方面,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影响地区间产业结构专业化的合理分工,不利于专业化水平提升。经济联系强度比

表9 201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三省一市产业同构与经济联系强度

地区	指标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上海市	产业同构	—	0.9489	0.9678	0.9154
	经济联系强度	—	849517	1012998	311172
江苏	产业同构	0.9489	—	0.9978	0.9945
	经济联系强度	849517	—	1883241	2793654
浙江	产业同构	0.9678	0.9978	—	0.9862
	经济联系强度	1012998	1883241	—	777010
安徽	产业同构	0.9154	0.9945	0.9862	—
	经济联系强度	311172	2793654	777010	—

大于1,人口首位度比和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比均小于1。安徽加入长江三角洲加强地区整体经济联系,但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变大,且中心城市首位功能减弱。

进一步测算(见表9),2018年上海与江苏、浙江的经济联系量大约为与安徽经济联系量的2.73倍和3.26倍,一定程度反映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龙头城市的扩散效应不足。从产业同构来看,上海与苏浙皖的产业结构相似性系数分别为0.9489、0.9678和0.9154,均低于安徽—江苏(0.9945)、安徽—浙江(0.9862)、江苏—浙江(0.9978),苏浙皖产业同构更为严重。

四、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制约因素

基于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0—2018年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融入能力和融入效果。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整体水平提升,社会一体化具有良好基础,协同一体化程度较高但仍需提升,市场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经济一体化变化平缓,创新一体化水平明显落后。具体来看,安徽与长江三角洲其他两省一市在金融市场、投资环境上的差距逐渐缩小,交通便利性提高,区域整体经济联系度加强。但一体化融合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如核心区域扩散效应弱,产业专业化分工效应降低,安徽存在经济产出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化水平低、公共服务水平低、创新产出和技术效率低等问题。究其制约因素,有4个方面不足。

1.上海“龙头效应”不足

2007—2019年,安徽GDP总量排名从全国第14升至第12,江苏和浙江一直稳居第2和第4,而上

海从第7降至第11,与苏浙差距拉大,与安徽差距缩小,上海龙头力量相对不强。上海与苏浙皖排名前10优势产业中有70%重合,产业同构性强,产业梯度没有形成,龙头外溢效应难以发挥。上海与江苏、浙江的经济联系量大约是与安徽经济联系量的2.73倍和3.26倍,上海与安徽经济联系最弱,对安徽经济辐射程度不强。2019年上海第二产业占比超26%,为打造金融科创中心,当好领头羊和排头兵,上海须将传统制造业转移,聚力打造高端服务业。

2.安徽“洼地效应”不足

安徽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约为沪苏浙均值的三分之二,并坐拥国家第一个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合肥,高级生产要素相对丰富,生态环境基础好,市场潜力较大,具有一定“洼地效应”优势。因长江三角洲产业同构性和交通网络便捷性,初级生产要素的“洼地效应”未能发挥优势。因创新成果转化能力滞后和公共服务水平不高,高级生产要素的“洼地效应”尚未发挥。安徽省需要加速构建创新成果转化链、实现产业差异化竞争、完善公共服务建设水平,才能创造并凸显最大“洼地效应”。

3.经济发展动能不足

安徽人均经济产出约为沪苏浙均值的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不足沪苏浙均值的三分之二,且近年来增长速度放缓,究其原因经济基础差、增长动力弱。虽然近年深入推进外资促进专项行动,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长江三角洲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但历史上,国家财政对安徽投入少,资本存量小。从新产业看,沿海地区主要发展制造业和金融业,而安徽过去的定位一直是农业大省,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从新技术看,安徽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率低。从新业态和新模式看,安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于“互联网+”的新业态、新模式探索不足,经济增长潜力有

待开发。

4. 发展战略差异化不足

安徽与沪苏浙的产业同构系数分别为0.9154、0.9945和0.9862,苏浙皖产业同构更为严重,这是由于苏浙皖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及区位资源有一定相似性,长期以来造成产业发展雷同和同质竞争。上海承担平台角色,在更大范围为长江三角洲吸引人才和资金,江苏优势在于制造业,浙江承担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安徽的优势和定位则不甚清晰,导致同质化产业承接。安徽一直在主动学习沪苏浙,寻求发展思路,但却始终徘徊在低端同质化中,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还需要在更大格局下找准自身定位,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五、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提升路径

针对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要以产业共生为切入点,创新驱动为抓手,要素配置空间耦合为载体,跨界协同治理为保障,发挥产业共生效应、创新驱动效应、城市功能互补效应、空间布局联动效应、区域治理协同效应。

1. 以产业共生为切入点,夯实深度融合根基

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深度融合需要通过产业共生建立更大空间合作网络,共同提高产业生存和获利能力。上海依然需要发挥好龙头作用,率先突破思维瓶颈,用更大胸怀、视野和格局,把自身经济转型、全球城市建设,与推动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把上海发展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谋划,在提升自身发展能级的同时,形成带动长江三角洲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更强动能。沪苏浙地区有半数以上城市将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列为主导产业。上海、浙江与江苏在各自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实施方案中,也提出打造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前沿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沪苏浙重点发展产业与安徽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有雷同。如果不参与长江三角洲产业分工协作,就会强化产业同质,加大同质竞争,也不能充分整合长江三角洲的资源禀赋。因此,安徽要充分发挥

重点产业优势,加快形成与沪苏浙相关联产业,相互合作、资源重组。

2. 以城市功能互补为着力点,构筑深度融合载体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但城市功能分工不合理阻碍建设进程。专业化功能是由城市经济、地理、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客观存在,其类型和程度在不同城市中可能存在差异。当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正在从过去的龙头城市“一极独大”强势领跑的单极化格局,逐步转化为“多中心格局”。需要清晰认识到,这种“多中心格局”并非“去核心化”。上海依然需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上海的核心地位越突出,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越好。城市群中不同城市需找准定位,明确不同城市分工,加强系统性的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强化功能布局互动。要着力发挥城市功能专业化和产业专业化的协同效应。城市功能专业化并不能代替产业专业化,同一功能类型的城市间,仍可以在产业层面形成分工。

3. 以创新驱动为抓手,增强深度融合动力

长江三角洲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初期过渡阶段,创新驱动是深度融合发展引擎。一方面,充分发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优势,以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为牵引,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建设为重要载体,着力打造“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心”分平台,形成多点支撑、多层并进的创新平台体系。推进以高科技、新领域和基础设施为主的“高、新、基”全产业链项目工程建设,形成集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于一体的高质量项目体系,为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劲动能。另一方面,与长江三角洲共建包容性区域协调新机制,构建协同创新生态体系,发挥“1+1>2”的聚合效应,将主导产业链嵌入长江三角洲创新链和人才链,构筑发展新优势,催生乘法效应,扬优势产业之长,补创新链之短,将产业链各环节融入创新链,形成价值增值,完善价值链。

4. 以要素配置空间耦合为目标,提高深度融合效率

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优化人口、资源和产业之间空间配置,提高要素配置空间耦合效率。高质量一体化要求从竞争

到竞合,从产业转移到产业协同,产业发展资源要素分布与产业链布局实现空间耦合。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不能仅限于产业间要素配置,而且要优化要素配置空间效率。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劳动力、资本与产业空间配置错位严重,难以推进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长江三角洲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布局不能搞均匀分布。各地区的要素要与当地的市场条件结合起来,要根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考虑布局,否则可能会引致区域间的资源要素错配、产业结构同质以及低效益、乱投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不是追求要素空间布局均匀,而是强调原材料、资本和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自由流动。随着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不适应性增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增多,城市发展模式应该进行调整,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5.以跨界协同治理为保障,落实深度融合责任

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涉及多维度和多主体,要想构建区域发展命运共同体,必须要突破行政区划约束,实行跨界治理,落实各参与主体责任。组建多层、多元跨界协调组织,建立健全重大跨界协调机制,最大程度实现跨行政区的产城融合、产业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增强或放大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和经济能级,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经济价值。环境治理可以借鉴“新安江”模式,与长江

三角洲城市建立上下游跨界生态补偿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等。

参考文献

- [1]范从来.安徽在一体化中的使命与作为[N].安徽日报,2019-05-07.
- [2]孟天琦.安徽深度融入更高质量一体化路径研究[J].经济论坛,2019(6).
- [3]姚玫玫.安徽与城市群耦合机制研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 [4]杨风华,王国华.长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进程分析[J].管理评论,2012(1).
- [5]陈坤,武立.基于相对价格法的经济一体化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3(12).
- [6]陈雯,王珏.长江三角洲空间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初步测度[J].地理科学,2013(8).
- [7]武义青,赵建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测度——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经济与管理,2017(4).
- [8]李世奇,朱平芳.高质量一体化评价的指标探索及其新发现[J].南京社会科学,2017(7).
- [9]顾海兵,张敏.基于内力和外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分析:以城市群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
- [10]曾刚,王丰龙.区域城市一体化发展能力评价及其提升策略[J].改革,2018(12).
- [11]陈耀.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思考[N].安徽日报,2019-06-18.
- [12]刘志彪.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石[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4).
- [13]陈建军.不失时机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4).

Measurement and Lifting Path of Anhui's Intergration into Yangtze River High Quality Integration

Fang Dachun Pei Mengdi

Abstract: Grasping the lev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hui's integration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Anhui's integr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and "into",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Anhui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steadily improv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has a good foundation; the degree of collaborative integration is relatively high, but it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integration is growing steadil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changes gently, and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integration is lagging behind. In view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leading effect" in Shanghai, the "lowland effect" in Anhui, the insufficient momentu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ack of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 should tamp the deep fusion foundation with industrial symbiosis, construct the depth fusion carrier with 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 of city, enhance the power of deep fusion driven by innovatio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eep fusion by coupling factor configuration space, and impl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ep fus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Key Words: Anhui;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easurement; Lifting Path

(责任编辑:平 萍)